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三十五辑(2012年第1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 | | |
|--------------------------|-------------------|
| 村社理性：基于苏南工业化经验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分析 | 董筱丹 杨帅 李行 曾天云 温铁军 |
|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民持久收入与消费影响的研究 | 刘浩 刘璨 |
| 中国货币错配程度综合度量及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陈守东 谷家奎 |
| 地方官员的专业禀赋与经济增长 | 张尔升 |
| 集体工业经济、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 | 马汴京 |
|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度量：时序变化与省际差异 | 陈屹立 |
| 经济国有化与行政垄断制度 | 陈林 朱卫平 |
| 贸易媒介理论 | 孙泽生 |
| 社会互动理论与经济学行为研究范式的改进 | 郭艳茹 彭涛 |
| 制度研究范式的现实分析思维 | 朱富强 |
| 性选择机制、不完全契约与婚姻成本 | 罗丙能 张国昀 |
| 公司治理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 党印 |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三十五辑)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2 年. 第 1 期: 总第 35 辑/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141 - 1573 - 4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新制度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91.3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2491 号

责任编辑: 岳 琨

责任校对: 康晓川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邱 天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三十五辑)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省三河市德利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7.25 印张 340000 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1573 - 4 定价: 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制度经济学研究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林毅夫	世界银行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邹恒甫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 办 单 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目 录

村社理性：基于苏南工业化经验的比较制度

经济学分析 董筱丹 杨 帅 李 行 曾天云 温铁军 (1)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民持久收入与消费影响的研究 刘 浩 刘 璨 (16)

中国货币错配程度综合度量及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陈守东 谷家奎 (48)

地方官员的专业禀赋与经济增长

——以中国省委书记、省长的面板数据为例 张尔升 (72)

集体工业经济、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

——基于 120 个大中城市的经验研究 马汴京 (87)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度量：时序变化与省际差异 陈屹立 (109)

经济国有化与行政垄断制度

——基于苏联银行业国有化进程的制度变迁研究

..... 陈 林 朱卫平 (121)

贸易媒介理论 孙泽生 (145)

社会互动理论与经济学行为研究范式的改进	郭艳茹 彭 涛 (174)
制度研究范式的现实分析思维	
——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问题	朱富强 (185)
性选择机制、不完全契约与婚姻成本	罗丙能 张国昀 (201)
公司治理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党 印 (213)
补贴政策对农民参与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	
——基于四川省农村问卷调查研究	李润平 (238)
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技能：一个经济学的分析	
框架	王海兰 宁继鸣 (252)
后记	(265)

CONTENTS

Rural Community Rationality: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n Rural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Xiaodan DONG Shuai YANG Xing LI Tianyun ZENG Tiejun WEN (1)
An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hina's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on Farmers' Permanent Income and Consumption ...	Hao LIU Can LIU (16)
Measurement of Currency Mismatch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esting in China	Shoudong CHEN Jiakui GU (48)
Vocational Endowment of Local officials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ake panel data of secretaries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for Example	Ersheng ZHANG (72)
Collected Industry, Endogenous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120 Cities	Bianjing MA (87)
The Index of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emporal chang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Yili CHEN (109)
National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 Institutional Change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Soviet Union's Banking Industry	Lin CHEN Weiping ZHU (121)
Trade Media Theory	Zesheng SUN (145)
How does the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Improve Paradigm of the Economic Behavior Analysis	Yanru GUO Tao PENG (174)

- The Realistic Analysis Thought for the Paradigm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he Issue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ath
Dependence **Fuqiang ZHU** (185)
- Sexual Selection Mechanism, Incomplete Contract and The Cost of
Marriage **Bingneng LUO** **Guoyun ZHANG** (201)
-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Yin DANG** (213)
- The Analysis of Impacts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Vocational
Training from Subsidy Polic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he
Countryside of Sichuan Province **Runping LI** (238)
- Language Skills As Human Capital: A Framework for
Economic Analysis **Hailan WANG** **Jiming NING** (252)

村社理性：基于苏南工业化经验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分析^{*}

董筱丹 杨 帅 李 行 曾天云 温铁军^{**}

【摘 要】本文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为例，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在资本投入严重匮乏甚至背负债务的情况下，苏南农村社区如何依托村社组织进行内部资源动员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尤其以成规模劳动投入替代稀缺资金要素；二是苏南农村如何依托村社组织进行各种制度创新，弱化原始积累阶段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化和农业衰败等负外部性；三是进入 21 世纪苏南农村在土地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如何降低与外部主体的交易成本。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可能比西方经济学的“个体理性”、“集体理性”更适合东方小农村社制之社会结构的“村社理性”的概念，并初步分析了村社组织租的产生机制。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 负外部性 村社理性 组织租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14 F32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是苏州大学出版社资助的《解读苏南》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为本文直接提供资料素材的还有顾婷婷、庄沙沙、叶茂。参与本文相关调研的还有：陈薇、贾阳、姜东、李行、刘亚洲、孙远东、杨帅、曾天云、周鹏辉、周向阳等；朱信凯、谷莘等对课题研究给予帮助，丁守海、杨殿阁对本文资料搜集和观点形成亦有重要贡献。本文写作同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化解机制研究”（07&ZD048）、中国人民大学 985 三期项目等的资助。一并表示感谢。

^{**} 董筱丹，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讲师；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100872）；E-mail: dongxiaodan@ruc.edu.cn。杨帅，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博士生。李行，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博士生。曾天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生。温铁军，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苏南工业化的研究，学术界早期无论是从要素配置角度进行的分析，还是对社区企业内外部主体之间关系的分析，有三个不足：一是注意关注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阶段各种要素的贡献度，而对农村社区基于传统乡土文化对村内外各种要素的动员与整合机制关注不足；二是大多数研究关注的主要都是制度收益，而较少关注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度成本问题；三是对于苏南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1 世纪以来两个阶段的发展之间有何联系，缺乏分析。本文将从“村社理性”的视角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乡镇企业改制以后，乡镇企业的一页历史已经翻过，但深入理解农村工业化早期依托村社理性进行原始积累并且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机制，不仅是对经济学中“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理论的重要创新，对于中国今天如何通过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来缓解“三农”困境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村社理性：苏南农村工业化的核心制度创新

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有竞争力的秘密既不是企业家的能力，也不是经营机制，而主要在于村社将资源内部化地进行资本化开发形成的企业利润中，隐含了以企业组织形式实现的 70% 以上的社区转移收益。

同时，在苏南农村，几乎所有的问题，如资金要素的极度稀缺，工农两部门的收益差别、村民社会保障，乃至于一般市场条件下企业遇到的风险问题，都通过社区内部化处理加以解决，最终形成公平的收益分配。^①

因此，中央政府称乡镇企业是农民的“伟大创造”。而苏南，则是这一伟大创造最具代表性的地区。

^① 这种制度安排的內因当然是社区全体成员以成规模劳动替代资本的方式进行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不可忽视的还有当时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由于财政亏空而将部分财政职能转移给乡镇企业，从而允许乡镇企业对支农建农资金税前列支，这是激励因素；刚性约束条件是社区的粮食安全问题——1992 年粮食市场放开之前苏南的粮食供给只能通过当地的农业生产来提供，1992 年虽然粮食市场放开，但 1993 年就因粮价大幅上涨而提出了省长“米袋子”、市长“菜篮子”工程——一直到 1997 年粮价回落之前，依靠市场来保障基本粮食的供应仍然不太现实。

（一）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依托村社“自我剥夺”

1. 资金要素：以社区内部化积累为主乃至“负资本”起步的工业化

苏南农村的工业化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起步以来，在产业层次上就不同于温州的家庭作坊式生产而呈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由此引出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要实现规模经济，企业往往需要较大额度的初始投入和流动资金，在当时中国资金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农村工业企业如何弱化资金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

在国家财政、金融双赤字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对农村的资源转移非常有限，因此社队工业难以像城市的国有工业那样，依靠国家财政和金融部门的投资来创建，大多数社队工业的初始投资主要是通过内部化积累进行的。以无锡县为例，社队工业资金中高达 95.4% 的部分为自有资金，银行信用贷款仅占 1.7%，政府的财政拨款为 2.9%，而国有企业的银行信用贷款则高达 44.8%。再比如苏州市，乡镇企业的自有资金在资金总额中占绝对地位，1980 年资产负债率为 37.17%，1982 年为 41.15%，1983 年为 41.04%。直到 1984 年以后，负债才成为乡镇资产形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

然而，能够形成自我积累的村还是比较幸运的。尽管苏南地属鱼米之乡，但一是缘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农业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使大部分农业剩余流向城市，广大农村地区只能采取平均主义导向的分配方式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二是苏南地区人口稠密，人地资源的矛盾非常紧张——以上原因导致了农业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剩余来满足社队工业的资本需求。

这其实是所有工业化努力——不分国别、不分地域大小、不论大到国家还是小到社区——都要面临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不同的是，在先发工业化国家对世界资源与市场瓜分殆尽的情况下，后发国家追求工业化已经不再具有海外殖民扩张、掠夺财富的历史可能，无论是接受附着各种苛刻条件的外部援助，还是内部化自我积累，发展中国家所付出的代价都是高昂的。对于苏南农村工业化来说，五六千年农业文明史中形成的小农村社条件下劳动力不计成本地投入等生产机制和各种内涵的制度安排，使其可以不必循规蹈矩于西方工业化“以资为本”的既成模式，而是依托村社组织，因时因地制宜地通过各种变通来形成对资金要素的替代机制。

现实中还有更“极端”的情况，很多村在社队工业发展之初，可供动员的农业剩余甚至为“负”；其能这样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的初步积累，没有村社这个组织载体，想进行要素整合与动员是很难的。

比如张家港市南丰镇的永联村，其社队工业资本的形成就是以负债 5 000 元的“负资本”起家的。^①

永联村隶属于张家港市南丰镇，是 1970 年江滩上围堰出来的村，在当时称为 23 大队，村民由周边 4 个乡 108 个村移民搬迁而来。到 1978 年 7 月吴栋材作为第八任工作组组长、第五任支部书记来到 23 大队主持工作时，永联村在这一带还是有名的“穷村、乱村、差村”，村级负债高达 6 万余元。在吴栋材这个在抗美援朝战斗中伤残的退役士兵的带领下，永联村最开始进行的是典型的“农业学大寨”——借款 5 000 元，动员全村 300 多劳力，历时 60 多天，挖土 5 万立方米，完善了永联村的防涝和灌溉系统，并挖成鱼塘 80 亩，水面近 50 亩。在此之后，永联村又相继开办了近 20 家队办工厂，到 1984 年与南丰供销社合办轧钢厂时已经积累起 30 万元的资金。

从这个过程中，5 000 元现金作为村级基本建设投入中的现金要素，因其要素稀缺性而有极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其用途是在全村人都能得到收益的农田基本建设领域支付的挖土方的现金补助和鱼苗投资这两块成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永联村完成了对本村人力资源的初步整合使之成为人力资本，并在接踵而至的村级工业化中成为最活跃的投入要素并能够有效地替代货币资本。可以想象，假如当初完全没有资金投入，当各个村最难服从约束的人聚居在一起时，很难“集中力量办大事”，将这部分潜在的收益增量变成现实。

由于这笔借款发生在永联村工业化之前，一旦投资失败要以社区未来的收益进行偿还，因此说永联村的工业化是“负资本”起步的。

由此引出苏南经验解读中最具理性意义的第一个讨论是：当资本稀缺为零甚至为负的时候，只有利用农村集体化体制下社队内生的组织收益，以成规模劳动代替稀缺资本，才在通常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初步的原始积累和生产发展。

2. 劳动力剩余价值的产生及社区内部转化

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力资本成为财富增加的主要来源，使得人地资源禀赋的密集化具有一种自我强化趋势，劳动力不计成本的投入亦成为小农理性的一个核心机制。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与 80 年代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都离不开这一传统农业社会内涵的“比较制度优势”。

在苏南的很多农村，以低成本的劳动报酬增加劳动积累是依靠“工分制”进行的。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工分是全国农村农业生产活动的记工凭证，凭借生产队记录的工分，村民可以在年底领取报酬。在兴办工业之后，苏南很多农村社区又把这种农业领域的凭证移植到工厂薪酬制度中，从而形

^① 本文所用案例均来源于课题组成员实地调研，以下不再赘注。

成了一种另类的、东方式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其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借助村社理性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机制，创造性地把劳动剩余价值和工业资本积累的结合放在一个更小但更为紧密的社队内部的环境下进行——由于到工厂务工的全是本村兼业务工的农民，都属于村集体的成员，也就为工分制度的继续推行创造了条件，工人到工厂做工后，并不领取工资，而是和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一样记为工分，到年底时才领取报酬。

第二，在苏南农村工业化的创业时期，那些从事乡村工业的劳动力可以接受大大低于城市工业劳动力、甚至低于务农收入的报酬，从而使得社队企业不必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根据西方经验所给出的说法——支付一个相对于农业收入较高但绝对水平较低的工资——来支撑利润积累，而是凭借社区内部一系列独特的乡土文化派生的社情机制，来压缩劳动成本开支。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硬性约束和村社内部化机制下，一方面，长期的集体分配导致农村中大部分劳动力的风险厌恶情绪极高；另一方面，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对立体制下形成的社队工业中的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务工社员）的预期收入，也并不以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而是参照村社内部的务农收入及其辛苦程度。因此，这个劳动力剩余积累的过程是非常平和的，没有劳资矛盾等社会冲突，务工劳动力和其他村民都乐得其所。

工分制是一种先积累、后付酬的分配制度，务工农民并不是当月领取工资，其工分是在年底由企业转给生产队，再由生产队扣除“两金一费”（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后交给个人（也叫“转队工资”，由生产从“靠工”折算为“工分”参与分配）。这样，社队企业就可以把社区成员的工资节省出来作为日常生产中的流动资金，而不需要对这种工资延期支付任何利息——这就相当于村民用自己的工资为社队企业提供了一笔免费贷款，为社队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降低了从外部融资的各项成本与风险。

工分记载的是预付劳动的积累量，但劳动者领取多少报酬还与工分兑现的分值有关。在苏南农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中，为了降低工资成本、增加企业积累，村集体在计算工分报酬时一般都采取压低分值的工分兑现办法。

比如在常熟市蒋巷村，以1984年为例，村民到塑料厂、砖窑厂上班的工分单价只有0.08元，而同期的农业工分单价为0.192元，前者不足后者的一半。以蒋巷村第18大队为例，1984年共有16人到塑料厂上班，当年他们共累积85989个工分，按每个工分8分钱计算，共计报酬6879元，平均每人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4元。另外还有13个人到砖窑厂上班，当年共累积40375个工分，仅支付工资3230元，人均月工资只有20元。直到今天，蒋巷村村民仍然沿袭着这种工资发放模式。

此外，工分还有社区内部共担风险的作用。一般说来，在效益好的年头，企业都能在年底兑现承诺，将工资支付给村民；而在亏损的年份，则只

能推到下一年结算，这实际上是村民共同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20 世纪 80 年代的很多研究都指出，城市中的“灰色收入”（不纳入正式工资的各种福利性收入）大约占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的 40%，而农村社区的居民长期以来并没有这些福利——正是这些本来属于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应支未支的福利，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转化为了乡镇企业的自有资产，表现为乡镇企业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如表 1 所示，1989 年，中国纺织工业中乡镇企业平均工资只有国有企业的一半多点。

表 1 中国纺织工业各类企业平均工资（1989～1991 年）

单位：元/人

企业性质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中外合资	3 663	4 232	5 674
国有	2 069	2 252	2 377
城市集体	1 368	1 688	1 862
乡镇	1 132 *	—	—

注：* 为所有乡镇企业工业的平均工资数。

数据来源：林青松、杜鹰，《中国工业改革与效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6 页。

3. 社区土地资源的自我资本化

土地，在人口年增量为千万级的中国，不是西方经济学提出的“相对稀缺”的要素，而是“极度稀缺”的要素；因人口更稠密而稀缺度更高的土地，如何零成本地从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是苏南乡镇企业原始积累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来源。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苏南农村的土地一旦由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有相当大的收益变现空间。但如果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规则配置，土地要素需要通过购买来获得，那么，在农村工业化初期苏南农村就很难具备自我工业化的条件，因为农村本地没有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来占有足够办厂的土地，这时土地资源资本化的主体就只好让位于外部资本，而农村本社区成员作为土地所有者能够分享到的土地增值收益往往很少，也就难以形成社区的原始积累。

事实上，在苏南，无论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前还是以后，乡镇集体或村民自治组织都或多或少具有在社区内安排土地用途的权利。从实践经验来看，社队企业作为社区集体所有的事业，使用本来就属于村社共有的“无风险资产”土地，因根本不必在创办之初支付代价而最大化地获得土地风险收益，且基本不受政府约束，因此，在乡镇企业的收益中，相当大部分是由土地资本化收益直接转化而来的。苏南经验的一个特点是：在农村社区内部将资源形态的农业用地“低成本”地转变为计价较低甚至并不明确的

资产形态的产业用地，然后将形成的土地增值收益向社区企业资产转移，形成农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比如，根据常熟市 1986 年的一项土地清查结果，被查的 4 277 个乡镇企业全部为“非规范”用地，涉及土地面积 27 087.77 亩，其中耕地 19 375.28 亩；平均每家企业非规范用地 6.3 亩，而全民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平均非规范用地为 29 亩。

同时，土地资本化收益在社区的内部化分配，弱化了土地用途转移中的社会成本。在大包干以前，土地收益的分配权归属于集体；社队企业是由社队集体发起的，其产权归属和收益归属也在集体。由于土地资源是公共产权，社队企业同样也是公共产权，二者在土地级差收益的分配上具备融通的条件，而连接这个融通渠道的就是社队集体组织，如村支部或村委会；加之，现实中，作为社区能人的村支书或村主任往往兼任社队企业的领导，他们在社队内部拥有崇高的威望，在社队内部工农业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上往往具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在由农转工、工业还很弱小的农村工业化初期阶段，村民之所以能够接受把社区土地的非农化实现级差收益留给社区企业用于其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作为可分配利润分配的处理方式，一是出于对社队领导权威的尊重；二是出于对未来收益的期盼。

由于苏南的社队工业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到江苏全省乃至全国大面积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 1982 年、1983 年，苏南的社队工业已见收益，相当多苏南村队在推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又自发实行了多样的联合生产——实际上就是以维护集体经济的名义延续了村社理性的生命周期，延长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对社队工业资本的支持时间。

由于土地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高度依赖，如果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决策权以及使用权受到削弱，那么，它对资本积累的作用就必然会减弱，因此，那些农村工业化强村大多数是集体经济强村。从全国来看，几乎所有社队工业发达地区在推行大包干方面都晚于传统农业地区，比如当时与苏南一道“坚持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浙北、胶东和辽东。

（二）资本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依托村社内部化处理

一般说来，只要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问题（这与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所讲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而产生外部性问题不尽相同）。而作为工业化“前史”的资本原始积累，因其“积累”特征，尤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问题，不论推动其进程的经济行为主体以何种身份出现。

尽管主流理论研究中不乏对资本积累负外部性问题的分析,但多数研究似乎更热衷于关注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知识和技术外溢而出现的所谓“正”外部性问题,而就历史发展经验看,资本积累初始阶段的外部性恰恰多以负外部性的面目呈现。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能否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则是一个比正外部性更为重要和紧迫的、具有自主创新意义的问题。

从中国整体的发展经验来看,其对于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从一开始就是认识清楚的,主要的化解机制则在于国家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以工补农”;这二者同时也是中国加快自我积累型工业化的重要手段。^①

中国的农村社区在农村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弱化负外部性方面,既有对国家“以工补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更有依托“村社理性”而另辟蹊径的创新。但在学术界,大量的基于乡土文化的制度创新至今仍鲜受关注。

苏南农村前述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一系列的初始制度安排,导致其在处理资本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方面跟西方具有根本上的差异。主要在于:作为以村为单位整体进入工业化的典型代表,其经验是主要通过发挥村社理性机制作用、形成内部公平分配收益的方式来化解资本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从而也就避免了西方历史上通过殖民扩张向外转嫁而带来的暴力和血腥。

财产关系最终表现为财产分配关系,生产关系最终表现为收益分配关系。

在苏南农村地区,产业资本原始积累是从全村资源乃至和每个人的基本生存相关的生产和生活资源转化而来的,由此形成的产业资本收益也必然要在社区内部公平分配,这样才能保证这种积累制度自我实施下去而不至于半路中断。这种公平的收益分配机制无论与后来人们讨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否有关,都更主要的是这种产业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与社区文化相结合所必然产生的制度结果。偏好任何意识形态而进行意识形态化讨论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制度结果来支撑己方的理论,而本来不必一概诋毁。

具体说来,这种公平化的收益分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就业机会在村内的公平分配;(2)通过压低务工工分实现工农从业收益的社区内部平衡;(3)社区福利保障。

1. 构建收益机会公平分配的内部化机制

在昆山市淀山湖镇晟泰村,1983年顾永元开始创建塑料厂时,只能提

^① 温铁军、杨殿阁:《中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及化解机制研究》,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8期。

供六七个上班的岗位。这些岗位与农业田间劳作相比劳动强度低，是“轻巧活”，说不定收入还能高些，所以全村村民的眼睛都盯在上面。但僧多粥少，村集体和塑料厂商量后，决定挑选几个体质较弱不能胜任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但又心灵手巧能够胜任“手握电烙铁，焊接一些小的塑制品”工作的人来补这个缺，结果六七个女孩子被挑中。对于这次工作安置，村民们没有产生异议。

之后，随着塑料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工作机会不新增加，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劳动力，这时采取的招工办法是：新增工作机会在不同家庭之间通过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这种看似原始的机会分配方式尽管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由于程序上和过程上的公平，得到了村民的广泛认同。在抓阄之前，村集体和塑料厂还额外补充了一个条件：优先保证那些还没有一个务工机会的家庭获得这样的机会，那些已获得了务工机会的家庭，不再参与第一轮的抓阄。只有当第一轮抓阄结束，并且每个家庭都有了至少一个务工机会之后，所有家庭再参与第二轮抓阄。

像这样通过抓阄来决定工作机会的分配，并不是晟泰村的独创。根据课题组调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那个时候，进社队企业上班名额的确定，在村里是件敏感的事情，村书记要是“搞不定”、“摆不平”，或者“一碗水端歪了”，就会失去威信，而最简单的、最不容易造成矛盾的分配办法就是抓阄。

抓阄看起来是件小事，是个土办法，实际上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公平、公正与村社凝聚力的问题，里面蕴含了一种和谐的内部关系，弱者得到照顾、强者作出一定的让步，从而避免了单纯市场化条件下的两极分化。比如，晟泰集团在就业安置中，就优先照顾残疾人，只要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的，集团就会给他们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也帮助其家庭减轻了负担。

2. 打造“绿色车间”有效避免农业衰败

工—农关系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处理、平衡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工业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苏南来说，农业发展同样是社队工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工农收益不均衡机制的影响，苏南农村工业化的整个过程中，农业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面临因生产三要素流失而导致农业衰败的难题，早期也确实经历了一个因忽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而导致农业减产的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南农村通过采取“绿色车间”的做法，有效避免了农业衰败的出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既往发展经验的新道路。

所谓“绿色车间”，是指把农业视作与工业车间并列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车间”。表面上是对农业部门的一种别称，实质上是为避免生产要素从